

寻找理性的苏非

——思·诗意·知^①

邹兰芳

素有“流淌着奶和蜜的富饶之地”之称的迦南，就是指今天的黎巴嫩、巴勒斯坦一带。这里是人类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诞生地，在《圣经》中被记载为上帝“应许之地”、“希望之乡”。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这里不断上演着多种文化交替、并存、冲突、融合的悲喜剧，至今仍是世人瞩目的焦点地区。美丽富饶却又多灾多难的地区孕育了一代代怀有理想主义情怀的文人墨客，诚如我国著名作家在评价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时说：“在天空中冷空气和热空气交融会合的地方，必然会降下雨露；海洋里寒流和暖流交汇的地方会繁衍鱼类；人类社会多种文化碰撞，总是能产生出优秀的作家和作品。”^②他们关注人类命运，渴望各民族超越政治、宗教、种族界限，在多元文化中寻找和谐发展途径，以求共存。黎巴嫩的米哈依勒·努埃曼(Mikhail Nuaymah, 1889—1988)就是这样一位久负盛名的思想家、文学家。1949年12月24日的《埃及人报》这样报道他：“米哈依勒·努埃曼是一所绝无仅有的人道的学校，是人类思想诸多高尚信仰中最忠诚者……如果阿拉伯世界，甚至整个东方要宣扬自己的思想家，以其哲学家、诗人和作家而自豪，那么，我们阿拉伯民族应该将米哈依勒·努埃曼列为我们当代的精神和文学的骄傲之首。”^③

如果读一下迈入古稀之年的米哈依勒·努埃曼在回望自己的一生时所写的

自传——《七十述怀》(1959年)，我们会发现诸多对他的评论绝无虚夸之词。这部长达850页的自传，以清新柔美的笔触，心潮澎湃的诗意，洞察幽微的思想，悲天悯人的情怀，多元文化的普世观，高屋建瓴的预见性，为读者打开了一扇窗，透过这扇窗，我们看见了作家抗拒生活的浮沫、追寻纯真的斗争的一生，而引领这一斗争的强大的力量就是在我们这个“属于密码、暗语的世界”里通过思索寻求真知、爱、诗意的充满理性主义的苏非思想。

苏非思想即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是一种从宗教信仰出发探究人的精神生命和宇宙生命的学问。其实，东西方宗教中无不包含神秘的内容，出现过各种神秘主义教派。伊斯兰教也不例外。起初，伊斯兰教的许多信徒的一生，就是一遍一遍背诵“古兰经”，生活力求清苦禁欲，到公元8世纪，这种禁欲主义者被叫做“苏非派”，而苏非派在宗教上最明显的转变是由禁欲主义的“畏神”变成神秘主义的“敬神”。在这段发展过程中，禁欲主义日益扩大了神学家和神秘主义者之间的裂痕。我们从“穆阿泰齐赖派”^④同正统派之间的分歧，以及哈拉基^⑤被处死和之后安萨里^⑥转向苏非派，都可以看出神学早已成为属于宗教范畴的阿拉伯文学。神秘主义思想与诗性思维的相通，为这个时期整个阿拉伯文学提供了背景，几乎每个重要文献的作者都与这个纷争有关，他们通过诗歌作品来表现自己的立场。

公元10世纪以后，苏非主义沿着两条路线发展：一条试图把神秘主义与正统派神学进行调和；另一条越来越走向泛神论和单纯信仰论，信仰“人神交融”、“人主合一”，逐步走上“刻苦修炼是人心灵净化和道德提升的过程，也是人摆脱束缚，实现人彻底解放和心灵自由的必由之路”。

有学者认为，苏非派诗歌因关注心灵，在中世纪为阿拉伯文学注入了活力，注入了精髓，使阿拉伯文学在其漫长历史中，其主题和题材或显或隐接受宗教和神话的影响，而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更是与神秘主义一脉相承。可以说，苏非思想已成为阿拉伯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内在神韵，熔铸在文学作品中。这也是我们在读努埃曼自传时，感受得最深刻的民族精神。

努埃曼苏非思想的成因——思

被米哈依勒·努埃曼称之为“一次冒险”的这部自传，可分为三个部分：孤独

^① 本文属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东方作家传记文学研究”课题(05JJ075D.47-99161)，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② 莫言，《好大一棵树》，《东方文学研究通讯》，2008年第2期，第38页。

^③ 努埃曼，《七十述怀》，陆孝修、王复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567页。本文中括号里出现的序号均是该书的页码。

^④ 8—12世纪伊斯兰教的宗教哲学派别。西方学者称之为唯理主义派。该派以唯理思辨的方法，自由讨论教义问题。阿拔斯王朝麦蒙时期，曾一度成为占主导地位宗教派别。

^⑤ al-Husayn ibn Mansur al-Hallaj, 857—922，伊斯兰苏非派著名代表人物。因宣扬禁欲主义和人主合一的“入化说”，被监禁、审讯，后由阿拔斯王朝最高法庭以“叛教大罪”，处以磔刑。死后被苏非派尊为“殉道者”。

^⑥ al-Ghazzali, 1058—1111，伊斯兰教权威教育学家、哲学家、法学家、教育家。正统苏非主义的集大成者，从理论上构筑了伊斯兰教正统的宗教世界观和人生观。

的少年;在美国;隐居“舍赫鲁布”。从他为已树碑立传的理由,我们可以看到其苏非主义思想的内核——准备“来世的干粮”。努埃曼相信“轮回”,认为人存在的目的就是认识自我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就是通过修炼、精进、体验,从围着小我旋转,直至大我,与主合一而获得真知,从有限到无限,从天到地,从人到主,返回神性之本的道路。^①为此,作者希望通过自传,“清算往昔,揭示内心,打开灵魂的窗口接受上帝之光”(447页),并希望总结自己的一生能对那些“寻找着,并知道如何寻找被浮沫掩盖着的事物的人来说,也可能会有很大的好处……”(575页)内省自我,清算自我,揭开遮盖着生活本质的幕障,在蛛网密布的内心隧道中寻找光亮,是作者作传的意图。

米哈依勒·努埃曼之所以深受苏非主义浸染,其原缘可归纳为以下几点:吸纳山水之灵气,兼容多文化宗教、哲学、文学之精华,充盈东方式的哲理思辨,饱蘸对自由、公正、人性美向往的诗情。

努埃曼的家乡黎巴嫩巴斯坎塔镇坐落在海拔2700米的绥尼山麓,距贝鲁特50公里。这里巨石嵯峨,溪水清澈,草木繁茂,景色秀丽。绥尼山熠熠闪烁,鸟儿鸣啭、轻风低语,泉流吟唱。在他眼里,巴斯坎塔镇“俨然成为一座茂密的大果园,山麓间片片红色宛如碧蓝大海中的颗颗红宝石”(21页)。

幼年的努埃曼喜欢“一个人在水渠边享清福……抬头静观朵朵白云在湛蓝无垠天空轻轻掠过”,他会在沙滩上画出条条曲线和种种图案,喜欢独自冥想的他与心灵中的伙伴会心交流时是他最快乐的时候(44页)。可以说苏非思想的因子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已深深扎根。

在拿萨勒——基督的故乡读书时,少年的努埃曼对满山环翠的吐尔山^②流连忘返,山中超然的孤独、无尽的幽僻能让孤独的少年感到有种神奇的力量,“与头顶上徘徊的记忆敞开心扉。”(74页)在远足的旅行中,他多次恍惚觉得忽然灵魂出舍,离开同伴,走在当年耶稣及其门徒行走的小路上。当他就读于乌克兰的西米那尔神学院时,酷爱莱蒙托夫的诗篇,他深深被诗人笔下的高加索层峦叠嶂的美丽景色所陶醉,决心一定要为黎巴嫩——他童年的摇篮和思想的膜拜地讴歌。

正是这诗性的少年记忆,最终使他在俄罗斯、美国求学二十五六年后,魂归故里,隐居家乡舍赫鲁布,渴望与他那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诗意般安居,他也因此被称为“舍赫鲁布”的隐士。他向往那“当年张望世界的窗口——巴斯坎塔我

那破旧的家……那里的山石、林木、鸟雀……绥尼和它的峰巅以及洞穴中闪烁的光影或摇曳的树荫……那是对根的眷恋……”(415页)

多重文化的背景从精神上进一步熏染了富有苏非思想因子的努埃曼。他出生于带有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双重印记的马龙教派^③家庭,从小就浸润着浓厚的基督熏陶。大卫的诗篇、爷爷的哀愁而甜美的劳动歌声、俄国学校赞美尼古拉二世的颂歌,是努埃曼早期的学习课本。很快天资聪慧、喜欢思考的他,渴望“寻求光明、指引和知识”(67页)。在拿萨勒俄国学校里,少年十分喜欢“诗韵简析”这门课,同时对俄罗斯作品的兴趣日益浓厚,读了一些译成俄文的法国小说以及契诃夫、托尔斯泰的作品,还一字不漏地读完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在乌克兰的学习生涯中,他更是大量阅读俄罗斯大文豪,如普希金、果戈里、屠格涅夫、高尔基等作家的作品。他尤其崇拜托尔斯泰,十分关注托尔斯泰和自我与世界的斗争,把他的胜利或失败看成是自己的,“他(托尔斯泰)寻找着自我,探索世界的真谛。像他一样,我也开始认真寻找自我和我的生存真谛。照亮托尔斯泰前进道路上的灯以及我赖以行进的唯一的灯塔,就是《新约》”(167页)。

在乌克兰学习的第三年,一股苦修的浪潮袭击着风华正茂的努埃曼,为了摆脱朋友之妻的情网,他远离喧嚣,于沉默中感受到爱在孤独里与心儿接近。青年的努埃曼开始痴醉孤独的欢欣。他“检查散落在心灵角落的良种和劣种,清理它的过去和未来的希望”,开始寻找“某种巨大、遥远而模糊的东西”。(132页)。那年夏天,努埃曼独自坐在舍赫鲁布高高的岩石下,看见冷冽透明的绥尼山泉潺潺流过,周围浓荫环抱,田野散落着刈割的农民和安详放牧的牛羊,他的思想掺合着浓荫、岩影仿佛行走在一条黑暗的隧道里,无数的声音在体内呐喊,询问:一切从何来,又向何去?突然他瞥见一丝天光,心儿顿觉豁然开朗。他觉得“我将在瞬息之间,目睹我的主,认识他,并同他对话”(154页)。正是这瞬间的忘我、寂灭、与主合一的体验,使他觉得自己“已与周围的一切水乳交融。完全有着同一躯体,同一付灵魂,一同向无限伸展”,这一瞬间照亮了他“未来的道路”。(154页)与周遭万物“一体同魂”的体验,使努埃曼能将人类看做与宇宙和谐共生的一分子,从世界大同的文化立场来看待文化问题、人类发展问题,跨越地域文化的障碍,消除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甚至宗教文化的传统或偏见。

^① 参见李琛,《阿拉伯现代文学与神秘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20—33页。
^② 以色列北部,拿萨勒东部的山脉,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杂居区,现多为阿拉伯人居住于此,被开辟为游览名胜。

^③ 马龙教派在基督教中属于东正教派一支,十字军东征后,信徒大多移居黎巴嫩北部山区。它明显受伊斯兰教的影响,规定神职人员能结婚,使用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保持古叙利亚教会的传统礼仪。

在美国读大学时,努埃曼不但对本民族的哲学、思想大师们,如伊本·西拿、安萨里、伊本·鲁西德^①,那绥里^②的学说做研究,而且对西方先哲们,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叔本华、尼采等人的思想也十分感兴趣。在这期间,他还认识了一位苏非神社成员的苏格兰青年,从他那里接受了轮回的思想。之后,他深入研究了自古以来的各种内学,研究了天启宗教和其他各种天道。他在一位印度青年的引导下,阅读了《薄伽梵歌》和《瑜伽经》,令他惊讶的是“它们彼此在时空遥远距离上的目的与方法竟如此接近。‘吠陀’^③、‘甚特阿凡斯达’^④和‘赫尔墨斯秘义书’^⑤相去不远。老子的‘道’无异于基督的‘归’”(210页)。他眼前出现了菩萨、老子和耶稣的面孔,他确信这三个人已经看到了他所要追寻的“庞大的、遥远而模糊的东西”。努埃曼意识到“我生来第一次感到上帝是我内心的一种力量。我们之间并非是一种人间的创造和被创造、崇拜和被崇拜、信仰和被信仰的关系”(229页),他迫切地感到“应该将自己从曾经陷入的浮沫中挣扎出来,单独和自己的心生活在一起”(354页)，“尘埃和蜃楼中没有我的追求。我只能在绥尼的怀抱之中,在与心幽聚时才能找到我的目的”(397页)。

我们从努埃曼的生命“寻找”中,看到不同宗教、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人们其实是殊途同归的,每一个个体都能通过内省,凭借“心灵之眼”感受到万物的普遍性和共性,而这种“心灵之眼”所具有的“悟性”是主先天的赋予,当我们悟到共性和普遍性时,我们就达到了苏非主义的理想境界——人主合一。

努埃曼苏非思想的内核——知

从努埃曼13岁离开家乡,先后在拿萨勒、乌克兰、华盛顿求学,到43岁返回故里,以及后来的隐居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一直在思考、实践、解答他的人生困惑,处理人与自己、人与人、人与神、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达到诸关系之间和谐地、诗意地相处。在他看来,人生就是掌握完全平衡的秘密。努埃曼认为,“我”是和宇宙中一切表现的和隐秘的事物相联的,对于“我”的认识就是最高深的知识——宇宙的知识,正如苏格拉底所说:“认识你自己吧!”这一知识是一切

① Ibn Rushd, 1126—1198, 中世纪阿拉伯著名哲学家、教法学家、医学家。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中科学和理性的倾向,综合了阿拉伯与东、西方伊斯兰教哲学家的思想成果,并在正统教义学家安萨里等人的论战中,使哲学摆脱宗教的束缚而得以独立发展。

② Nasir Khusraw, 1004—1008, 波斯著名诗人, 十叶派宗教宣传家。学识渊博, 精通教义学、法学、哲学和伊斯玛仪派的“内学”。

③ Veda, 用古梵文创作的流行于伊朗、印度一带操印欧语的各民族的颂神诗歌和宗教诗歌。

④ Zend-Avesta, 波斯古经。

⑤ 公元1世纪前后有关神灵启示, 神学和哲学的作品。实际上是东方宗教的要素和柏拉图哲学的一种融合。

知识的基础。“只有当你学会了如何与人共处, 既不伤害他、也不被他伤害地和他同吃同喝, 结为友邻, 那时, 你才找到了通向知识之路”(454页), 才能“让知照亮心田”, ①这里的“知”指的是“真知”, 而“知”就是苏非思想的内核。

苏非主义者把认识的对象——知识归于神, 提出由“神的自身本质构成知识”。随后, 他们又把获得的知识分为两大类, 一为通过心灵的, 二为通过理性思维的。在他们看来, 这两种知识的价值截然不同, 前者属于神智(即真知), 后者属于普通知识。鉴于两者性质不同, 达到认识这两种知识的途径也截然不同, 前者通过内心修炼, 由神给予灵魂的启示而实现。这种认识被苏非派的代表安萨里称为“灵感悟悟”; 后者则通过思辨、勤奋、凭借客观经验实现, 被安萨里称为“经验型知识”。苏非派认为神智无所不在, 它融化在每个认识对象之中, 达到对神智的认识就意味着对神本体的认识, 这种认识, 也是对认识客体而言的主体意识的表现, 是客体与主体意识的最终综合。这种表现和综合, 证明了人神合一的确实性。而经验性认识, 充其量只不过是客体的反映, 对它的获得不含有主体意识成分。②那么, 人是否能达到真知呢? 努埃曼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认为, 对于真知, 每一个人内心就是自己的“实验室”(209页)。努埃曼在《人的价值》③一文里认为, 人本来就是完美的, 他是宇宙的秘密和隐秘的宝藏, 是自然存在的目的, 而人存在的目的就是认识自我的过程, 人在探索身体奥秘和物质特征时, 通过物质方式获知灵魂的隐秘, 通过可见的东西了解合理的内涵, 科学家从实际的试验逐步转向理性的观念, 达到精神的感觉, 直至上帝。人在不断认识过程中, 日臻完美。一旦知识到达“绳子末端”, 便会发现自己站在显微镜、望远镜都无法达到的能力面前, 于是惶惶然不知如何称呼它, 称之为“上帝”吧, 或称它为“力量”, 或称它为“意志”、“法律”。由此看, 上帝就是人自己, 是人崇拜自己、热爱自己、追求自己的产物, 上帝因人的需要而被造出来。因此, 上帝是“道”, 是人、宇宙、万物存在之规律, 是存在之共性和普遍性, 各类宗教、天经殊途同归, 相去不远, 老子的“道”无异于基督的“归”(210页)。努埃曼写了《三种面孔: 老子·菩萨·耶稣》一文, ④他确信这三个人已经看到了他所要追寻的“庞大的、遥远而模糊的东西”。在这里, 我们看到, 努埃曼的苏非思想是超宗教的思想, 既汲取了尼采关于“超人”超越自己的思想和自由精神的合理因素, 又调和了各宗教之间的

① 《努埃曼全集》, 卷六, 《米尔达德书》, 贝鲁特百科知识出版社, 1970年, 第633页。

② 参看蔡伟良编著, 《灿烂的阿拔斯文化》,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年6月, 第81—82页。

③ 《努埃曼全集》, 卷五, 散文集《世界的声音》(1948)中《人的价值》, 贝鲁特百科知识出版社, 1970年, 第377页。

④ 《努埃曼全集》, 卷五, 散文集《阶段》(1948)中《三种面孔》, 贝鲁特百科知识出版社, 1970年。

门户之见,弘扬了苏非主义是“一种心灵的饥渴”,是“不受历史久远、语言或民族的局限”的人类精神现象的内涵。

这样说,是不是人就是无所不能、掌握真知的神了呢?不是。努埃曼认为,人对自身的了解,是寻求真知的过程,也是自我认识的过程。人起初并不认识自己是谁,他将自己与世界分割开来,给自己造了一个对立面,从此就制造了不幸和灾难。人是“左手提灯的盲人”,“右手擎着黑暗的明眼人”,是“从精神逃入坟墓,又在坟墓中寻找精神的粗心人”,他认为,人这位“明眼的盲人”在摸索他在宇宙中的道路时,不断地捡起散落在路边的精神碎屑,当他拾起“我”的碎屑时,他也拾起了被他称之为“世界”或“非我”的碎屑,他想保存好“我的”,而把“非我的”扔掉,其结果发现他把“我”和“非我”都扬弃了。(325页)由此,我们看到,努埃曼敏锐地指出了人性的弱点,与生俱来的二元对立性,一方面在建设自我,一方面在破坏自我,一方面想做更好的“我”,另一方面又丢失了“自我”,在“骑驴找驴”的盲从、迷惘、无知中,制造出种种的不幸和灾难。那么如何协调“我”和“非我”呢?关键是对这个“非我”的认知,这个“知”就是努埃曼及其苏非思想的“真知”——“非我”不是外在于“我”的另一个人,如果是外在于“我”的另一个人,那么这个认识过程必然是否定自我,抛弃自我,去做虚幻的“非我”之梦,这样的认知必然是虚妄的、谬误的。人必须认识到你所追求的那个目标就存在于自身内部,是自我不断的更新,是自我一次次地再发现,是自我的不断超越,直至有一天豁然觉悟:我即是神,神即是我,从而实现“人主合一”。正如苏非派代表人物哈拉基在他的《诗集》中所说:“他(指真主,笔者注)我分彼此,同是一精神;他想我所想,我想他所思”^①,因此,人认识自我的过程,就是人的本体意识的觉悟过程,是“灵感悟彻”的过程。

在“灵感悟彻”之前,人充满了矛盾,欲望和恐惧并存,悲痛和欢乐同在,自由和枷锁相依,生命与死亡并行。而通向“我”与“非我”和谐、“人主合一”的路径只有一条,那就是“爱”,那种对人类本体中美好品质的忘我的神往和热爱,甚至痴醉,也就是苏非思想提倡的“神爱”,它认为,人只有淹没于对真主的神秘之爱中,焚毁私欲,灵魂才能得到净化,才能达到爱者(指人)、爱、被爱者(指真主)三者和谐完美的统一。

在这一方面,努埃曼不仅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而且自己身体力行地实践了自己认识世界、包容世界、克服欲求、追求真知的“近主之路”。他说,“你心中无

刃,便不会看到人们的恶;人们中若无善,你也不会感到内心的美”,“如果人们中没有纯洁、美、忠实、诚恳,那么,这些美德就不会出现在他们的精神中。它如不是根植于人们的本性之中,也不会表现在他们的精神之中”。(373页)也就是说,人既有神性,又有人性,既有善也有恶,恶是善的扭曲或丧失,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人与自己的关系。每个自我都有完善自己的可能性,其方法就是用人的神性克服人的弱性,从围着小我旋转,直至大我,与主合一,与万物合一(220页),达到最好境界。为此,努埃曼一直努力在克服自己的权欲、富欲、情欲、名欲和永生欲。

在爱情上,努埃曼虽先后经历了与几位女性的恋情,但终生未婚。他认为,无论是爱情还是婚姻,都不能建立在欲念之上。“爱情不是欲念,是生活的心和本质,借此,你会在你的精神中看到宽恕、忍耐和宽阔的胸怀,并将以美好的容忍和十分的理智迎接一切突变。”(405页)他感悟到,洁身自好的实现只有靠对贞洁自身的爱、对贞洁撒播在心中的纯洁感情的痴醉(82页)。这种“贞洁之爱”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忘我的“神爱”。在给弟弟纳西布的信中,他说:“(爱情)使我的精神更加富有……主宰的精神欲使男人和女人升华为比任何欲念都更为强大的完人、统一的人。”(410页)无疑,努埃曼向往的爱情是柏拉图《理想国》中的精神恋爱,是一种建立在宽容、忍耐、达到两性和谐相处、完美统一的纯洁之爱。

对于权欲,努埃曼始终是报以不屑的观点,他批评那些把地球看做宇宙中心的人是“够无知的了,但更无知的是那些把人看成是万物之主,使人成为宇宙之主的人”,他十分反感那些为满足权欲使用卑鄙手段的人,他们在会议上戴上假面具,显示自己原是比较众人高贵的泥土,“然而他们距离那绥里对弟子们的训导:‘欲为人主,必先做众人之奴’,是多么遥远!”(478页)他借耶稣的话说:“有人在获得普天下的人的同时失去了自己,这又有何用?”(167页)

关于永生,努埃曼认为,个体的生命是有限的,一个人无论生命有多长,也难以获得宇宙的全部知识,人的认识是有片面性的。然而,人作为宇宙的一部分,生命是一种延续的运动,它从一种状态转向另一种状态,两者之间我们称之为“死亡”,因此生是死的一部分,死也是生的一部分,这就是“轮回”之说。人的肉体生命是有限的,但精神生命是永存的,这也是人类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真谛。努埃曼注重精神生活,追求精神超升。在他看来,一切可见的东西和合理的事物都是精神状态。人闭上眼睛,望着自己内心的最深处,便能看到世界的普遍性和局部性,了解它的规律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方法和媒介,理解所探索的道路。每个人

^① 《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编,四川辞书出版社,第192页。

都能看到本体,而看到本体,就看到了纯粹的生活内核,他把这种内心的观照,看做内心的试验,“人的心就是自己的实验室”(209页),而每个本体者都是纯粹的生活内核。世界上的一切都存在于人,因人而存在,为人而存在。世界上的一切都存在于人的内部,所有存在于人内心的都在世界上。一滴水有着浩瀚大海的全部秘密,一粒原子中有着地球上的所有元素。一次思想活动中有着世界一切的运动和秩序。只要相信真知,相信主,人的生命便没有尽头,人将同一切事物那样永存。^①

努埃曼认为,人之所以讨厌死亡,是因为他没有很好地热爱生(457页)。1932年,他从美国回到家乡后,虽蛰居舍赫鲁布,但他“从没有屈从于品德的放纵和对崇高的人的价值的玩忽”(82页)。而是以积极的人世、救世的心态来建构自己的精神世界。他一方面远离繁华,深居简出,躬耕著述,另一方面积极为各院校、俱乐部、社会团体做各种报告会,积极从事慈善事业,在他的“方舟”(他蛰居的禅房)接待来自阿拉伯各国和其他国家的来访者,为村里没文化的乡亲们无偿做“秘书”工作。他说:“我没有离开过人们,人们也没有离开过我。和我的心一样,我的家门日日夜夜冬夏常开。我获得人们的了解胜过了我博得他们的青睐……但我十分注意我的独身和独居……把交往中的一切进行消化……”(575页)努埃曼的生死观是一种热爱生活、既出世又入世的积极的人生精神追求。在物欲横流、享乐主义盛行、唯利是图、道德沦丧、人性异化的今天,努埃曼的这种抗拒生活的浮沫、追寻纯真的精神、注重通过净化心灵以自我提升的人生观,无疑为我们树立了一座丰碑。

努埃曼苏非思想的归宿——诗意地安居

努埃曼以自己抽离美国浮华都市、隐居家乡、返璞归真的举动,践行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与自己的思想方式相一致”的托尔斯泰式的人生信条。当他从美国回来时,耳际响着形形色色文明化的喧哗,脑子里堆积着一座又一座思想的火山。他像中国的庄子一样,向往田园风光,他“吻过舍赫鲁布的小棚,吻过棚前那棵古老的橡树和树下的泥土”,面对绥尼山、坐在树荫下,眼、耳、血、肉、心绪、思想统统都沉醉了,“沉醉在佳美和欢乐中”(434页),这里,“天比镜子明亮,和风更比梦幻中情侣的耳语温柔”(434页),这便是努埃曼“工作的世界”,对故土的眷恋使他像个孩子一样,全身心地与自然交融相投。这也是海德格尔笔下“诗意地安

居”所在:“群山无言的庄重,岩石原始的坚硬,杉树缓慢精心的生长,花朵怒放的草地绚丽又朴素的光采……所有这些风物变幻,都穿透日常存在,在这里突现出来,不是在‘审美的’沉浸或人为勉强的移情发生的时候,而仅仅在人自身的存在整个儿融入其中之际……”^②这种安居是把自身作为宇宙一分子完全融入宇宙的欢欣和喜悦,是人摆脱了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束缚,为自己的岁月,以灵魂的名义放声歌唱的欢欣和喜悦。因此,努埃曼的隐居,不是隐士对尘世的逃避,相反,当他听到“身下的碌碡机械地转动着,铸铁的牙齿啃磨着麦穗,不断发出诱人的音响”时,觉得“犹如最负盛名的乐队在乐迷心中激起的涟漪”,他“心头溢出无比的喜悦。”(16页)努埃曼苏非思想的“思”和“知”深深植根于他回归的富有诗意的故土本源中,居者和居地两厢情愿,和谐相处,亲密无间,互为依存。努埃曼找到了其本源,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③

努埃曼还乡接近本源正是他苏非思想的归宿。当他为了求知,在他乡漂泊多年,目睹两次世界大战西方对东方的骄横,以及西方日益严重的物质主义弊病以后,当他广泛涉猎,博古通今,谙熟各种内学、天经和教派的教义,通晓人类共有的文化、文学精神遗产以后,他意识到西方的科学技术应与东方神秘主义蕴含的哲学智慧互补,他感到“指导文明化的科学,自身也需要向导”(317页),他呼吁“东方回到它那比西方文明化更强大和更永久的信念中”,东西方应该和谐共生,只有消除战争,消除冲突,人类才能在精神文明的阶梯上迈上一步。因此,他的回乡具有回归东方、从东方内部找寻自我、找寻民族发展出路的意味,他疾呼“东方应该重新确立和捍卫自己的信念”,他遗憾“东方仿佛没有认识这种精神”(320页)。他的追寻自我之路和阿拉伯民族找寻民族现代化之路是两相结合的。东西方矛盾重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失衡的背景,以及努埃曼自身的文化修养和特殊经历,使努埃曼的苏非思想具有更理性、更博大的思想内涵,使努埃曼能够跨越地域文化的障碍,以更高的角度,从世界文化立场来看待文化问题,人类发展问题,使他有可能摆脱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甚至宗教文化的传统或偏见,将多元不同的文化视为人类大家庭的共同财富,让多元文化和谐共处,从而融会贯通、兼收并蓄、东西合璧,达到人类理想社会的图景。

^① 参看努埃曼,《七十述怀》,陆孝修、王复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415—424页。

^② 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第83页。

^③ 同上,第87页。